我的老师冯至

李肇星

我在山东胶南老家上中学时，在鲁迅先生一本什么书中读到过这样的话：冯至是“五·四”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。

等我到北大念书后，才知道冯至是我们西方语言文学系的主任。两个月后，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冯至本人。那天傍晚，我们到京郊大兴县一个人民公社参加劳动后坐校车返回，他在北大南校门迎接我们。我们下车列队后，系学生会主席、一个德文专业高年级学生说：“请系主任冯至先生讲话。”

我看见从欢迎队伍中走出了一位头发又多又乱、有点像爱因斯坦的发型的中年人。如果不介绍，简直会把他当成锅炉工，根本不会想到他是一位“抒情诗人”。他穿着一身不知洗了多少遍的中山装，上面好像还缺了几粒扣子，脚穿一双布鞋。只有他宽大脸庞上那副又大又圆的眼镜，显得很有气质。

提到爱因斯坦，是因为我们大都熟悉他的照片。听说当时北大的副校长、物理学家周培源曾是爱因斯坦的学生。而我在北大的“三好”学生证书和毕业证书，都是由副校长先后颁发的，当然这是后话了。

冯主任在暮色中站在我们面前，犹豫了半天才开口，他语速很慢，完全不像他在《西郊集》中的诗句那么流畅、轻快。他说了好一阵，但内容不过是：同学们干了一天的活儿，肯定累了，我代表系领导欢迎你们。我不多说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们快回宿舍，洗洗脸，洗洗脚，早点休息。

第一次听诗人讲话，只听到了这些，心里有点失望。　40 多年后想起来，冯先生朴素得真像一位农民老乡。后来我才悟出来，他的魅力也许正出自他的真挚和朴实。

半年后，冯至先生开始教我们德国文学史，他讲课的口气、语速、风格，还是像那次给我们致欢迎词那样。他的课不是特别吸引人，课堂上笑声也少，但却能够一步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步地把学生引进歌德、席勒等大师们的殿堂。冯主任的学术活动、行政工作和出国任务很多，有时也请他的研究生李淑替他讲德国文学史，李老师风华正茂，很受欢迎。

在德国文艺批评家中，冯至先生特别推崇莱辛。他认为，学文学读一点文艺批评很有好处，可以提高自己对好作品的鉴赏力和对坏作品的批判能力。另外，世界上的书籍浩如烟海，还不断有新书问世，即使读完其中一小部分也不可能。唯一的出路是，通过读文艺评论来了解自己没有读过的一些重要的书。

在德国诗人中，冯先生最喜欢海涅。他援引海涅的一首歌唱纺织女工诗作中的句子时，完全不看讲稿。他向我们热情推荐海涅的明志名句：我是剑，我是火焰…… 他还给我们讲卡尔·马克思与海涅的故事，说马克思和他的女儿都喜欢海涅，常在一起聊天、喝咖啡，还问一些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。马克思的女儿问：什么样的错误最值得原谅？马克思说：相比较而言，轻信朋友的话这样的错误值得原谅；又强调，观察实事比听人家说话更重要，一个行动胜过许许多多的宣言。有一次，他调侃海涅道：诗人当然与凡人不一样。诗人只管才思飞扬、妙笔生花就够了；等饿了的时候，上帝会把烤好的面包放在一个漂亮的小篮子里，用一根绳子从天堂吊到诗人面前……

我听过冯先生十几堂德国文学史课，唯有这一次在课堂上引起了愉快的笑声。在笑声中，学生们对这位平易近人的德国文学史专家和杜甫诗歌研究的大师，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多的爱戴。

（2005 年 8 月 3 日《济南时报》）

拐弯抹角

——余墨：《中国舞台的歧途》

萧　乾

在读 18 世纪英国文学时，我最喜爱斯威夫特和菲尔丁两位讽刺文学大师的作品；在各类体裁的文学中，我最倾心的也是讽刺文学。写这种作品，大都需要勇气和机智，因为要在太岁头上动土。菲尔丁那个一生潦倒，客死于里斯本的老头子，竟敢用他那支犀利而巧妙的笔，直诛当朝宰相。

1946 年我由言论自由的英伦回到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的上海，十分“不服水土”。八年抗战后，民不聊生，特务横行。武人当政，内战一触即发。心中很是气愤，但又不能正面顶撞，否则不是遭捉拿，就是被暗杀。于是，我就借谈论舞台艺术（以及“中国音乐往哪里走？”）对时局表示了自己的看法。

这里，“脚本”指的是宪法及法律，由一演员独占舞台指的当然是蒋介石那时实行的个人独裁，后边跟着一簇跑龙套的。文中指出这种演法不但比不上西方“戏剧”，连爪哇和非洲热带森林都不如。

关于改善之道，我提出第一是先把便衣打扮的特务赶下舞台，然后，得有个脚本作为行动的根据。

现在看来这当然是肤浅之谈。脚本也要看是什么样的脚本。跑龙套的也只是为了吃饭。他们上边还有豢养者。

有趣的是这篇冒充外论迻译的寓言式“论文”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后，竟然使戏剧家田汉同志上了当。他以为真是一位洋人在谈中国戏剧。于是，就代表上海戏剧界在上海《申报》上写文，一本正经地作了答复。

其实，对戏剧我是个大外行。“译文”不过是伪装。我是借戏剧（和音乐）反对当时国民党的“戡乱”。

后来我又曾模仿《老残游记》用正面笔法写了几篇对比新旧的“神游”文章，写我所憧憬的理想国。

作于 1997 年 1 月 3 日

（1997 年 1 月 15 日《济南时报》）

观邹德忠书法

张中行

书法家邹德忠先生来，说他又将印一本书法作品的选集，希望我能够说几句。大致是一年以前，他曾送我一本 1995 年印的《邹德忠书法集》，我看了，印象如何早已模糊，现在是人家要求说几句，只好找出赠书，再读，看看能不能拼凑几句。如一切喜舞文弄墨的九字号的，嘴里说能不能，心里其实是想写。想写会碰到量力问题，我是经常在老伴评论的两个半句合为一句的“样样通，样样稀松”方面，“知”取后半句，“行”则开放，取前半句。

如大人物，自以为样样通，就胆量大，以至于狂妄，敢批某书，敢批某人。我位低因而人微，不敢有批什么之想，狂妄的出路就成为拿起笔，写自己未必有知而以为颇有所知的。有关书法的种种正是这样，查旧账，竟也写过几篇。其中有现在看了不至脸红的，如《左撇子》和《学书不成》，都说自己不是亲近书法的材料，以致也临过碑帖而总是写得不像样就是。可惜是笔没有写到这里就停止，而是仍前行，闯到哪里呢？也举两篇为例。一篇是《〈论书绝句〉管窥》，《论书绝句》是启功先生的大著，我竟敢窥之，可谓圣人门前卖《百家姓》。幸而启功先生“肚”量大，能容人，我没有遭棒喝而过了关。另一篇是奉张志公先生之命，为他主编的《现代汉语》写“专题”文《书法》，这就更上一层楼，不止于窥，而是登上讲台，在初学面前大讲其教训了。都讲了什么呢？记得有历史，有怎样学，像是还不自量力，讲了怎样分辨好坏。碰好坏，证明我会有些偏见，这里想顺水推舟，结合邹先生的书法，拼凑几句。

好的所谓法书，形态或风格可以万殊，而好的基本条件则只是一个，笔画有筋骨。这看法不是我闭门造车想出来的，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早已这样说。同样一支笔，蘸墨往纸上画，甲的有筋骨，乙的没有，以及能看出有无的分别，是怎么回事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言难尽，甚至卫夫人及其徒子徒孙们也未必能够说清楚。我想知难而退，不深追所以然而只说印象，邹德忠先生的书法，楷隶也好，行草也好，笔画都有筋骨，也就值得看看。

另一点值得说说的是他用功几十年，至今仍恪守古法。在书法方面，我不隐瞒观点，是保守党，总觉得古人造诣过高，未吃透古人而高喊创新是大言欺人，或以怪诞文浅陋。邹德忠先生不是这样，而是写隶则沿汉人的足迹走，写楷则沿唐宋人的足迹走。这样做，估计有人会有意见，我是认为不为时风所移，成就如何且不说，总可以避免走上岔路的危险，这就很好。

邹德忠先生是山东胶东人，欧阳中石先生也是山东人，他在《邹德忠书法集》的序里说邹先生的字“有他自己的个性”，“字如其人”，“憨直、质朴、敦厚、诚恳的鲁人个性特点，在他的字上都有体现，这一点是没法掩饰的，其实也不必掩饰，可能这正是自己的书风特色”。我也有类似的观感，看笔画的形态，邹先生字的风格是刚健，锋芒显露，与流利、用笔求含蓄的不是一路。这与性格有关，也许临池，多看石，少看纸，也有些关系吧？大道多歧，走上哪一条都可以当名家，谨祝邹先生勉之。

邹先生新的一本法书选集名尚未定，稿本我也未见，适暑中少事，再读已印的一本，拉杂写了一些，且算作向邹先生请教吧。

1998 年 8 月6 日于京华北郊

（1998 年 9月 7 日 《济南时报》）

《生命的记忆》序

黄　裳

十多年来，子善先生辛勤致力于新文学史料的发掘、考证、整理，成绩喜人。他搜集、编订了周作人、梁实秋、台静农、叶灵凤等人的佚文，为读者提供了可读的文本，给研究者摊出了难得的资料，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。他开手辑佚的工作时，周作人、梁实秋还是被排除在书林之外的“另册”人物，绝料不到后来居然会“热”起来，在不同意见纷起之时毅然从事，终底于成，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识。周作人后半生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的，但作为新文化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，研究者还是不能略而不论。要论，就要考查实证。在《周作人集外文》两卷中，就辑存了周作人自己删去的大量佚文，大致恢复了《真谈虎集》的本来面目，在读者和研究家看来，无疑是一种快事。对梁实秋作品的考订整理，也是子善先生用力甚勤的一个方面，有《梁实秋著译年表》为证。

中国过去有悠久的辑佚传统，曾蔚为文苑中的别国，如严可钧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就是一种名著，为文学史家离不开的文献渊薮。继起者代不乏人。鲁迅先生的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、《古小说钩沉》也都是人们熟知的。先生的一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就是植根于《钩沉》的。基本史料与研究成果之间的紧密联系，灼然可见。鲁迅先生是自己动手收集素材的，因为前人没有留下可以凭依的资料汇编。这就给后人以启示，人们已经重视并着手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，成绩是显然的，方向是正确的。这中间就有子善先生的劳绩。

前人进行古文献的辑逸，主要依据的是古典文献类书、总集。偶有细心的学者搜索广及地志、文集……如厉鹗的《宋诗纪事》，就为这一工作扩展了视野，是可以借鉴的方法。新文学辑佚工作所依据的则是报刊、杂志和单行著作，辅之以回忆录、社团史料等，其实还是大有扩展余地的。要达到知人论世的效果，是非把眼界更扩展到

社会、政治的大环境不可的。书中不少记述前辈与辨析史料的文字，就提示了这种研究扩展方向的可能性。作者所援引的书报杂志甚多，这些报刊的背景、倾向与当时作家的思想变化是息息相关的，都是可以进一步探索的课题。比如在30年代，梁实秋所用的笔名就有秋郎、陈淑、敬远、子佳等数十个，这就又有一个考定的问题，作者付出的劳动是可以想见的，往往一篇短文之成，作者不知翻遍了多少书报、杂志，而这些在今天又几乎成了“孤本秘籍”，残缺断烂，检索为难。作者埋头于资料的探寻中，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，这是读者读这本《生命的忆记》时，难免会产生的沉重之感。

作者又是一位新文学书刊的收藏家。他曾记下历访北京琉璃厂、上海文庙书市的访书经历，读了恍如重睹北京厂甸书市风光。但其辛苦搜访的岌岌心情，却与“冷摊负手对残书”者迥异。偶然拾得一二珍异册籍，就亟亟写短文记之，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欣喜之情。他在北京无意中得到宋春舫褐木庐的藏书，就是这种奇遇。宋先生穷毕生之力搜集的7800册戏剧藏书，50年代已捐赠给北京图书馆，但仍逃不脱狼藉市上的命运，真是言之痛心。不论长篇短制，作者记下的都是值得珍重的史料。子善先生年力正富，未来的收获正无穷尽，这是读者殷切的期待，也是对作者的鞭策。

（1997年7月21日（《济南时报》）

“老牛”校长王祝晨

臧克家

我回来了，一些模糊了的记忆也随着鲜亮起来，像一觉醒来，天亮了。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，小巷里，很少有人认识我，我默默地用眼前的现实——一条街名，一个小馆……去对正我的记忆。

最使我发生兴趣的要算都司门口的“第一师范”了，现在虽然是“司法厅”的牌子挂在大门的一旁，我还觉得它是我们的母校。每次从门口经过，一种亲切的感觉便喷泉似的从心头涌出，而一些往事便也翻腾起来。我怎能不如此呢，这个学校培植了我初期的革命思想，终于来不及等到毕业即跨出了大门潜到武汉去参加了 1927 年的大革命。我怎能够不如此呢，我在这个学校里住了三年多，我怎能不记起启发过我的那些先生，我不能不记起一道从事过革命工作的那些同学，我不能不带着尊敬与感谢想起我们那位“老牛”校长——王祝晨先生（“王大牛”的绰号是声名在外的）。

在开会的时候，“司法厅”做了代表的宿舍，而我们却住在另外的地方。借了找朋友的机会，我跨进了我的母校。我一步一步地走着，我一步一步地看着，我一步一步地想着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上忽然冒出一句话来——“前度刘郎今又来”。我几乎把它念出声来了。早年间，门口的大街上，抱着张督办（宗昌）大刀的执法队，那闪闪的刀光，暗淡了；那踏踏的慑人魂魄的皮靴声，渺茫了；韩复榘的“青天”塌了；王耀武的威风一去不复返了。然而，然而多年后的我却又回来了。

望着东南楼，我带着深厚的友情想到同行到武汉而最终死在广州暴动里的曹星海、刘增，还有我的小叔叔臧功郊；那间音乐教室，不就是每晚熄了灯之后，我们借着月光与星光在里边秘密开会的地方吗？那个“书报介绍社”——山东文化的宝库，思想火种的来源——书架上摆满了马列主义进步的书刊《创造日刊》、《语丝》、《洪水》、《沉钟》、《莽原》……人蜂拥在门外，形成了抢购的热潮。这些纸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的文字，打进无数头脑里去，武装了它，立即化成了行动力量。走到篮球场旁边，仿佛那个患着严重肺病的庄龙甲——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——仍然用着他那羸弱的姿态依傍着篮球架子站在那里，可是他却被当时的反动当局给枪杀了。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王尽美，他的那双“大耳朵”（他的外号）也被记起来了。我所要拜访的少年同班好友——孙兆彭和我一同住过的西北楼东北角上的那个房子里，地板还是那么破。当年张宗昌的大兵要来包围、搜查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恐怖而又仓促地把一些书籍和杂志填进去；焚烧信件的烟气辣得眼泪直流，纸片子带着红尾巴到处乱飞……

我的记忆对我是一个秘密，多使人高兴啊。我给这个秘密找到了证人，这个证人又是这些事实的创造者和领导人，这个证人就是王祝晨先生。就是他，做过我们的校长，曾给我们请来一些革命先进者和中外权威学者来作了短期讲演；就是他，叫我们办“书报介绍社”，办夜校——是的，像同学刘兆（三次被捕，最终死在了反动派手里）那样优秀的共产党员每夜有机会去接近群众，他热情地讲着，粉笔在黑板上写着，粉笔像思想一样扑到了听众心上；就是他，掩护同学们下到工厂里秘密工作，等到事情被发觉了，枪毙工人的布告上写着介绍人的名字，张宗昌派人来按名要人的时候，同学们跳墙逃走了，事情由他顶着；但是他终于顶不住了，我离开学校不久，同班同学李广田被捕了。一年之后，王校长被撤职了。以后，我们一直在隔离着，连消息也不多。

1937年冬天，抗战爆发五个月之后，我在西安碰到了我的这位敬爱的老校长。他并没有老，反而更年轻了。他从不在后辈脸前拿架子，他使青年们感觉到他是自己这边的一个。他到我们的小旅馆里去看我，带着全份的《一师周刊》。他说他正在写一部几十万字的自传，完成后，要我给他看看，他的话牛筋一样的，半天一句，然而一句就抵它一万句，多真切，多温暖，多醇厚呵。那时候，他从美国回来的儿女都在工作，生活得相当好，孩子们不要他再做事了，他拒绝他们说：“我又不是一只猪！”他吃着大饼，向他的儿女使眼色，叫他们听，大饼在他的牙齿底下，咯吧咯吧响得那么有劲。

1942年我到了重庆，在绵阳国立六中时来了一位朋友，他谈到学校里的一些事情，无意中说到了我的“老牛”校长。他说，“五四”那天，王先生在班上大谈

“五四”的革命意义，讽刺了国民党的反动，一些“三青团员”站起来质问他，骂他是共产党的尾巴。他不声不响地站在讲坛上，等这些糊涂青年静下来了，他又慢张张地开了口：“要好好想一想，你们看，你们比我还年老得多呢！”下了课以后，墙上出现了一头“大牛”，身子上标着“打倒”，他望了望这头“牛”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你们就打不倒。

我这位朋友，起初还不知道我同王祝晨先生的关系，他不过把他的事当新闻来报告。后来知道王先生是我的老校长，他说得更加起劲了。他说，王老先生真了不起，每天读唯物论的书，拿《新华日报》当课本读，在上面划了无数的道理，他在和落后的同事、学生斗争，他在和自己斗争，他也和他的儿女们斗争。他的一个儿子在美国读理论数学，他的另一个儿子在天津一家工厂里当工程师，他把一些马列主义思想的论文剪下来，附在长长的信里，同他们笔战，他要攻破他们的观点——不沾政治气味的纯科学、纯技术的观点。

那次在济南碰见王祝晨先生他仍然是一个校长，不过不是“第一师范”而成为“第一中学”的校长了。校舍在新东门，从前“女中”的房子。我几次去拜望他，他在办公室里忙得不亦乐乎，教职员都是一些青年小伙子，他站在他们的队伍里，却并不显老。满院子都是男女学生，活蹦乱跳，叽叽喳喳，像一群小鸟，恍惚间，我觉得自己就是其中一个。他带着我到校舍的每一部分去参观，许多地皮空着，许多空房子门破窗残，像整个的济南一样，到处残留着战后的创伤，等待着恢复。我们老校长，他指给我，那里要建造一座新房子，那些房子要修葺好了当教室，他的语气间充满了希望和自信。从他手指的地方，我眼前浮现出了一片崭新的远景……

春节刚过罢，有一个中午，我同羡林、长之一起到“七家村”我们“老牛”校长家里去喝春酒，这一天，他对着他的这些老学生，特别高兴，小口呷着酒。花生米在他口里响出声来。他谈着自己的故事，慢腾腾地一句又一句。他说，他当“一师附小”主任的时候，第一次请了女教员，风声立刻传出，谣言跟着也就来了：“说我和女教师通奸。有人还写了呈文告到教育厅去，弄来弄去，弄了个‘查无实据’。”他幽默地说着，我们却都大笑了。他又说他提倡简体字挨骂的故事，反动派对着他说：“那样，你的‘妈’不变成你的‘马’了吗！”我们的老校长，虽然那

时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却一点老态也没有，我们自然十分高兴。我常在商埠里遇到他，七八里路程，他仍然保持着安步当车的老习惯。一看到他一步一步艰难地移动着他那个小山似的胖身子，一种崇敬的心使我肃然起来！我们的“老牛”校长越活越有劲了，加在他身上的工作也越来越多，“一半时间在会议室里，一半时间在路上；校长快成为一个象征的名词了。”他这样说着，心底里是愉快的。

我们的“老牛”校长从事教育工作四五十年，这是多么崎岖多么漫长的一条道路啊。“老牛”校长闯关似的，也闯过了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、 1927 年大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抗因袭照搬，开一代新风，艰苦奋斗、不屈不挠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，一站就是数十年，这是容易的吗？这是人人能办到的吗？我亲爱的老“牛”校长，我忘不了你给我的思想教育，我常常因为想到你而产生一种精神力量。我还记得在“人代大会”场上，你从背后拍了我一下，把那双大肥手握着的那个蜜饯梅子默默地递给我：仿佛我是一个小孩子。我亲爱的“老牛”校长，让我以赤子的心遥祝你的健康——遥祝你越使越旺的牛劲，替人民拉犁。

（2002 年 5 月 12 日《济南时报》 ）

曹汝霖是我亲戚

于光远

读《万象》 2002 年第 4 期刊载的何兆武写的《“一生真伪有谁知” ——读曹汝霖回忆录》一文时，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视点，这是因为曹汝霖与我是“不算远”又“很远”的亲戚。

我的祖父母生了三个男孩儿。我亲生父亲行三。大伯父死时没有一个男孩儿，说不清楚谁做主，把我过继给大房。大伯母姓曹，同曹汝霖是亲表兄妹。按旧社会宗法关系来说，曹是我的亲表舅。因此该说他同我是“不算远”的亲戚。说我们的亲戚关系“很远”，这是我们上海城里人，毕竟同内地城市和农村不一样，“过继关系”看得比较淡。当然在继承不动产方面（我祖父名下有不到一亩地皮的房基地）我可以得到大房那一份。但是我并不和我大伯母过日子。我和我的亲生父母一直生活在一起。我的住房虽然同大伯母的住房紧邻，只有一墙之隔，但我从不去她家，我也从来没有叫过她一声“妈妈”。

但我同曹汝霖之间还是有过一次“接触”的。 1913 年，我父亲在袁世凯北洋政府的陆军部任职。 1915 年底，我出生四个月后，就从上海到了北京。听说曹汝霖曾经来我家，并且抱过我，还说“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”。受到“卖国贼”的祝福，是我的一个特殊的经历。

“五四”时，曹汝霖成了卖国贼，我伯母的弟弟，我的舅舅，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人，也对曹汝霖十分气愤。听说一次曹到他家走亲戚，那时曹汝霖的确是“国人皆曰可杀的历史人物”，他被我的舅舅用门闩打出门外。

曹汝霖究竟是哪个地方的人？福建人，还是上海人？我不知道。十来年前，我的一个本家告诉我，上海城内有四个有名的民间古建筑：第一处是乔家路（过去叫齐家洪）上徐光启的住宅。徐光启的住宅叫“九间房”，后来又成了“七间房”，并且在

乔家路上有七个门牌号码。徐家汇是因徐光启出名的地方，而乔家浜徐光启的住宅，鲜为人知。第二处古建筑就是我们郁家老宅。它也在乔家浜，位置在徐尤启故居东，靠近小东门。第三处是上海大南门里同仁弄的曹汝霖家，我家前门在顾家弄，也在大南门里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那里有一条同仁弄。第四处是大东门外的郭家。这样看来，曹汝霖有可能是上海人。

曹汝霖的住宅有名的不是上海同仁弄的那栋，而是北京的赵家楼——被学生们火烧的赵家楼，据说学生们当时只是放了一把火，并没有真正烧起来。现在，在那个地方建起一座赵家楼宾馆。共青团北京市委在那里的墙上钉了一个牌子，说明这是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遗址。赵家楼离我长期居住的东城史家胡同不远，但我也有好多年没去那里了。

（2002 年 8 月 11 日《济南时报》）

批评的退化

谢　冕

建国之后的文学批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是“文革”以前，文学批评是毛泽东思想在文学领域里的运用，总的观点是对过去没落文学的大批判，是对新文学的褒扬。充满火药味，文学批评话语与政治话语不分。姚文元是这种批评文风的集大成者。第二个时期是新时期开始到 1985 年，文学批评与文学一样拨乱反正，回到批评的本体上来，对“文革”期间一些扭曲的现象进行了矫正，出现了文学批评的繁荣现象。第三个时期是 1985 年到 90 年代初，方法热开始冲击中国文学批评界，信息论、系统论、控制论以及西方多种文艺思想像潮水一样涌进来，批评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抱了这些方法，文学批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，同时也带来一些“囫囵吞枣”的后遗症。第四个时期是 90 年代以来，文学批评走向各种“后”的歧路，后现代、后殖民、后新时期等轮番登场，还有一些批评家所标榜的“第三种批评”

这四个时期之后也就是当下的批评怎么样呢？

批评在文学中变得越来越没有地位了，批评正在退化。文学批评不对文学作品说话；文学批评失去锐气；文学批评没有文学性。上述三点是当今文学批评的通病。

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候，文学批评充斥着政治术语，批评家满口“八股”而惟独没有自己的语言。在那时候，倡导并弘扬批评的个性，甚至主张“我批评的就是我自己”，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，其观念是前进的。

但批评家若对批评的“不自由”属性没有认识，无限制地扩张他自认为的“自由”，那就会产生偏离甚至歧误。批评家批评的首先是作品，他不论如何海阔天空，他的翅膀总有无形的羁束。他的飞翔只能在文本提供的范围之内，这就是此刻和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“不自由”。不对作品说话，洋洋洒洒下笔万言而让人不知

所云，不仅让人厌恶，而且是批评的绝症。

当前的批评留下了很大的空洞，夸夸其谈，不着边际，一时成为风尚。批评的语言千差万别，愈是不同你愈是正常，愈是一律你愈是失常。但有一点，却是共同拥有的特性，那就是认真、切实、深刻地面对文本。浮华和喧嚣是批评的大敌。而不务空言的切实分析则是不论何种“主义”或学派都应具备的品质。

我们曾经非常熟悉“一呼百应”或“居高临下”的批评姿态。在过去，我们曾经认为惟有此种姿态才是文学批评，那是我们的批评患了时代病。在新的历史时期，我们摒弃了那种一厢情愿充当“真理”代言的批评角色的同时，也弃置了那种全知式的训诲的语言。这无疑是非凡的进步。但这不是说那种恶劣的风气已经过去，在某些人、某些刊物上面，我们不时还能看到它的丑陋的影子。但它的确已经没有多少生气了。

当前的危机不是来自上述那种倾向，而是来自它的反向。当前的问题是太“甜蜜”了。在以往，没有恐吓便不是战斗，而现在，则似乎是没有溢美和阿谀便不是文学批评。有些批评是可以交换的，有些批评是“广告”的另一种说法。抛弃了霸气的批评，如今连锐气也丧失殆尽，这不能不说是批评的悲哀。

（1997年1月29日《济南时报》）

楸树花

刘心武

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北京很难见到楸树。这是一种容易栽培，而且可以笔直生长到二十米高，顶部形成一柄大绿伞的树木，无论作为庭院树还是行道树，它都非常适宜；我在北京老宅里，见到过用楸木雕刻的垂花门以及制作的太师椅，还听说这种木材特别耐湿，雨淋水泡都不会变形。但我对楸树形成特别深刻的印象，则是上小学时，有一回跟妈妈走到隆福寺的一棵大楸树下，我抬头一望，高兴地叫了起来："哈！多大的牵牛花啊！"妈妈笑了，蔼然地告诉我："牵牛花是草本植物，哪儿会开在这高大的乔木上。你仔细多端详一会儿吧，看清楚了吗？它张开的花顶像是两片对称的嘴唇，牵牛花却像浑圆的喇叭。这是楸树花。很好看，不是吗？"

隆福寺这个地名现在还在，而寺庙已荡然无存，那株大殿旁的楸树，也不知捐躯何处。我对那株楸树，特别是初夏它枝叶间簇簇淡红的双唇花，却永难忘怀。还有一个难忘的原因，是在那棵树下，我挨过打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每天都要穿过隆福寺去上学。另外不少同学也如此。那时隆福寺的殿堂大都兼作库房，通道旁都设满摊档，是个每天都营业的百货市场。放学后，跟一群男生在寺里跑来跑去，看热闹，做游戏，是最开心的事。班上有个男生，脑壳较小，两只招风耳却很大，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，退学到寺里摆摊卖袜子。有一阵，我们还在上学的男生，由个头最大的铁拳领头，放学后总要到那袜子摊前骚扰一番。铁拳当然是个绰号。班上男生大都有绰号，大多数绰号并不怎么难听，我有时也就随着叫。但铁拳给那卖袜子的同龄人取的绰号发音是比基多耳，意思是比男人裤裆里的那东西多两只耳朵。他往往离袜子摊很远就开始怪叫，不少同学应和着，还非要人家答应他。我跟铁拳他们一起玩藏猫猫、拍洋画儿、弹玻璃球什么的，都挺自如，可是，到袜子摊起哄，就不大愿意，至于叫人家那样的绰号，心里就更梗着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